

2008 年 SGI 日和平倡言

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池田大作



2008 年 SGI 日和平倡言

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池 田 大 作

2008.1.26



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

作者: 池田大作

版权: 创价学会

联系地址: 160-0017 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左门町 15-3

电话号码: +81-3-3353-4291 传真号码: +81-3-3353-4368

网址: chs.sgichn.org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录

原教旨主义的复苏	3
纪德的人道主义	4
还没有结果的挑战	6
历史学家米什莱提出的宗教观	9
超越“部分正义”的诱惑	12
人权架构	16
保存地球生态系	17
维护人的尊严	24
非洲世纪的人的尊严	28
创建和平的基本潮流	31
东亚不战的潮流	35
语句解说	38
作者简介	40
和平倡言一览	41

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

迎接第三十三届“国际创价学会（SGI）日”，我怀着冀求世界永久和平的心情，在这里谈一下我的感想。

约半个世纪束缚着国际社会的冷战构造终结后，新世纪的到来也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但是依然看不到有效的新世界构造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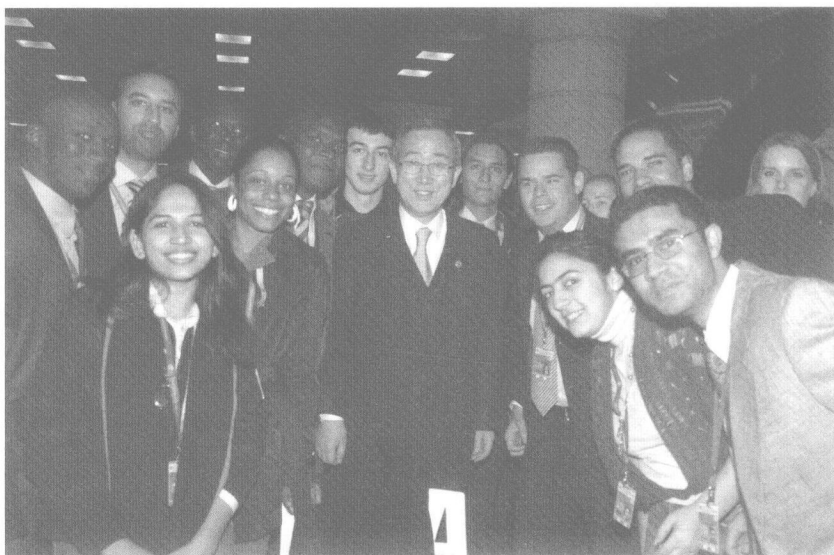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 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化学奖获奖人）博士在其生前与我见过四次面，并一起出版了对话集（1990 年 10 月）。为继承他的遗志，我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莱纳斯·鲍林与二十世纪展》。

博士在对话集的开场白中展望未来，说：“一想到今后世界形势的动向，我就心潮澎湃，并增添了勇气。苏联已经开始行动。在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领导下，着实地掀起了世界裁军的潮流。（中略）人类将首次如愿以偿地沿着‘理性’与‘道理’的大道上前进。世界由此而开始转变。”（《对生命世纪的探求》）一想到此，我眼前不禁浮现出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和平战士的温馨面容。

遗憾的是，从这以后的发展与博士的期待大为背道而驰。在全球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潮流之中，以走在先头的美国为中心形成的“新世界秩序”，虽一时大占风头，但由于不断出现新的冲突而变得日渐衰退，现在则近乎于无秩序状态。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倒转的。如果不排除万难，摸索构筑新的世界秩序，只有不断增加全球化社会的混沌。

尽管如此，各方面也是试行错误地尝试以各种方法来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首届“不同文明论坛”，和与会青年代表合影（2008年1月15至16日）。（Ben Powless 摄）

1月15日至16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文明联盟论坛”（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Forum）（注解1）就是其中一例。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不可或缺的就是努力克服文化上的敌对意识。论坛由超过七十五个联合国成员国及国际机构参加。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讲演中说到：“也许你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展望。但是，大家都分享着同一信念，就是文明联盟，正是与极端主义相对抗、排除威胁我们世界的分裂活动的重要方法。”

另外，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今年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中，提出以重视人性及团结等为核心的文明政策，说“治理二十世纪的方法，是不可能用来治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为改革的一环，提出新的方案，把现有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扩大，加入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五国，发展为十三国集团。

我一直也主张加上中国、印度等国家，让高峰会议发展为“责任国家首脑会议”，使得更具全球化形式来分担责任。因此我对这提案深表赞同。

◇原教旨主义的复苏

冷战结束后，被高高举起的“新世界秩序”大旗，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与“民主主义”。两者从本身的意思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要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落实时，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岂止如此，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由、民主主义，如果放松继续向上的努力，就会堕落为似是而非的结局。

这点在柏林墙崩溃（1989 年 11 月）之后的 SGI 倡言中，我根据柏拉图的洞察进行了表述。

也就是说，“自由”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最终会产生出大群的“欲望”之人。当“青年的心灵城堡”崩溃的话，就招来无可救药的混沌和无秩序。为了收拾残局，如同期待着“一只带刺的雄蜂”那样，“民主制”就倒退为“暴君制”（注解 2），历史就会变得倒行逆施。

这一警钟绝不是杞人忧天。金融主义的全球化，就像缺堤的洪水，招致世界规模的贫富差距，拜金主义与不公平感蔓延，成为恐怖活动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原因）。历史教训表明，分析恐怖活动和犯罪的构造原因时，不细致地处理，只靠力量来压制，会使事态变得更恶劣。只靠力量带来的秩序，与无秩序及混沌只是一纸之隔。

作为信仰佛法之人，我最担忧的，就是随着这种风潮，令原教

旨主义复苏。

不局限于备受争议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还有种族中心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牵涉到各种原理的教条，都趁着此混沌时代，旁若无人地开始横行霸道。

结局是，万事皆将“原理”、“原则”优先于“人”，“人”成为其仆人。在此不一一细说其详，我认为爱因斯坦所讲的话最能表达其义：“原则是为了人而制订的，而不是为了原则而有人的”。

原理、原则是为人而有的，此事绝不能颠倒。但要贯彻这一铁则并非易事。人惯于依赖原理、原则，因为它能提供快速的“答案”。西蒙娜·魏尔（Simone Weil）曾说，人和社会不断被内在的某种“重力”所牵引，使之逐渐失去自尊，丧失“自我”。

创价学会所标榜的人性主义，能对峙及扼制原教旨主义的复苏，是一种通过不息的精神锻炼，使人能夺回其主角地位的人性复权运动。

◇ 纪德的人道主义

在这里想介绍一段描述原教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对峙的令人难忘的轶事。这里讲的是法国著名人性主义大家纪德（André Gide）所发表的关于他访问苏联的体验。

1936年6月，接到他所崇敬的高尔基（Maxim Gorky）病危的消息后，纪德马上飞往莫斯科，而第二天高尔基就去世了。参加完葬礼等后事以后，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苏联各地旅行，这是他过去就一直希望的。在同年的11月上旬，他将旅行的感想《访苏归来》公诸于世。

感想出版以后，不单在法国，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也掀起了可说是历史性的大论战。

书中，纪德在充分认同俄国革命及以后的苏联发展历程之上，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逐渐冒出的弊病进行了剖析。他许多尖锐的分析，在苏联崩溃后的现今完全兑现了。但他那些在今天虽然会被认为是非常保守的指责，在当时还是很难让所有人去接受。当时被称做“红色的三十年代”，而且受到与法西斯主义作战的西班牙内战（注解 3）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青年人一窝蜂似的趋向左翼，把苏联看成希望之星。

正因如此，被认为是左翼成员的纪德的警告，于学界、新闻界、政界掀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正反两面，不如说大多数持“反对”意见，更多人将纪德当成叛徒，令他处于近乎孤立无援的状态。

但是，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纪德没有后退半步，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断言：“就我个人来讲，与我自己、与苏维埃相比，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人类、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文化。”

我认为他的话清楚明快而一针见血，甚至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性宣言。对于纪德来说，人道主义并非今天那些陈腔滥调再而不能引起共鸣的语感，而是几经磨炼，除此之外再没有正义可言的、一种普遍性的立场。

“与我自己……相比，还有更重要的……”纪德所指的文化，是一种有着普遍价值，能尊重自他、尊重差异与多样性、自由、公正、宽容的精神。为此，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正是这一信念支持着纪德，让他不被当时的潮流所吞没。

这种人道主义的普遍精神，令人联想到佛典中说的“法性的渊底，玄宗的极地”（诸法依据的根本真理）。这种普世的佛性，有时以

“宗教的人性化”就是二十一世纪摆在人类眼前的最大挑战。……要紧记宗教是为了人性的向上，为和平与幸福而有的这一点。

坐在莲花座上的佛为象征，是一种万人俱备、清静不朽的心性。佛法人性主义的基本主张重视人的尊严，指出各种宗派主义主张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不同，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是流动而不是死板的，时而需要整理其阶级顺序，来构成一个最适合人生存的社会。这里重

视的不是“原理”，而是“人”这个主角。

因此，佛典中有说到：“此云八万四千法藏，皆悉一人身中之法门也。然则，八万四千法藏，是我身一人之日记文书。此八万法藏孕怀于我心中，以我身中之心，思于我身之外，求佛、法、净土，是云迷也。此心，值善恶之缘，而造出善恶之法。”（日莲大圣入御书 589 页）

“八万四千法藏”虽指释尊一生的说法，但从广义来说，也就是指包含着所有“差异”的世界。这世界其实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了解到这一点，就要努力超越一切“差异”，达到万人平等的境界。这境界应该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一切的归结。所有原教旨主义都将这一点颠倒，只重视“原理”而非重视“人”。

◇还没有结果的挑战

半个世纪以前，将一生都奉献给研究、介绍法国人道主义的东京大学渡边一夫教授，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肆吹捧“原教旨至

上主义”时，提出了“宗教的人性化”。

“第二次宗教改革，就应该是由新的路德（Martin Luther）、新的卡尔文（John Calvin）来进行。用新鲜的字眼来表现，就是应该推行‘宗教的人性化’。宗教的人性化就是指要抛弃一切‘鸦片’性质的东西，甚至认识到神也是为人而存在的。人很容易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机器或奴隶，要对这弱点进行反省。不但自己如此，还要教他人如此。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有的收获，要阐明其责任。”（《渡边一夫评论选》）

回顾之后的六十年，乃至最近的宗教状况，不得不说对于这个提问还没有找到答案。最大的证明是，一直与宗教问题经常连在一起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这一词语。

尽管如此，也绝不能将其放置不管。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构筑和平的原动力的宗教，反而变成了战争和纠纷的原因。

因此，我在题为《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的哈佛大学第二次讲演中（1993 年 9 月），强调首先要观察宗教对人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使人“变强”还是“变弱”、“变善”还是“变恶”、“变聪明”还是“变愚蠢”。为要真正使宗教变得人性化，我们要把这问题向包括佛教的所有宗教提出。

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为了究明伴随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盲信与仇恨，以他设立的“埃利·威塞尔人类基金会”（Elie Wiesel Foundation for Humanity）支持召开了数次以“剖析仇恨”（Anatomy of Hatred）为题的国际会议。

他解释其动机为：“如何说明为何至今有许多知识人士败于盲信的诱惑？又如何能使宗教摆脱盲信的诱惑？……有史以来，只有人



1993年9月，池田SGI会长应哈佛大学之邀，作了第二次演讲，从“开创和平的源泉”、“恢复人权的关键”、“万物共生的大地”三个观点，探讨了大乘佛教对二十一世纪文明的贡献。

在忍受着盲信与憎恶之苦，而也只有人可以铲除它。在所有的创造物之中，只有人能够和会犯下这一罪行。”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呐喊，是对宗教人性化的恳切冀望。

少年时代，威塞尔在奥斯威辛与母亲、妹妹失散，后来又在布痕瓦尔德目睹了父亲的死。这是一个曾亲眼目睹纳粹这最恐怖的原教旨主义的人的话语，多么有分量、多么有说服力。而且，这也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避而不视的课题。

如果不努力去认识和进化，只执着于固护一己之派系的话，那么这种宗教就会把人的精神性削“弱”，使其转向“恶”，变得“愚昧”，而增加其“鸦片”的部分。结果只会助长战争与纠纷的发生。这就是威塞尔所指的原教旨主义的倾斜，是人类历史上一一直存在着的宗教的负面，其数不胜数的例子就不用一一枚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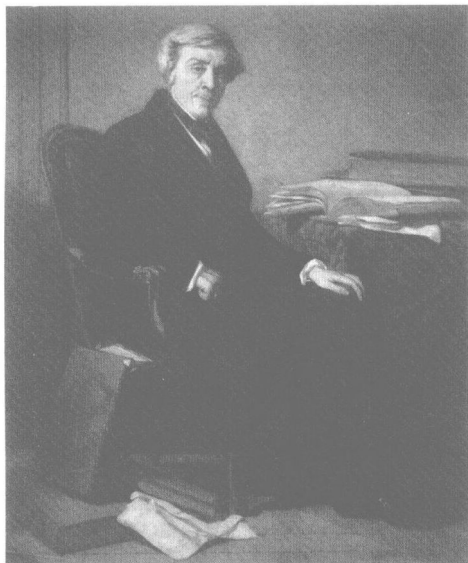
“宗教的人性化”就是二十一世纪摆在人类眼前的最大挑战。

探究人类史上宗教与信仰的正负两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在此我不想深入讲述。但至少在考虑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宗教的应有状态时，要紧记宗教是为了人性的向上，为和平与幸福而有的这一点。

◇历史学家米什莱提出的宗教观

就此，我一直关注着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宗教观。

米什莱出生的时代是被称作东方文艺复兴时代。正如于其数世纪前欧洲文化的复兴受到古希腊、罗马文明较大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则热衷于印度、波斯等东方文明。



朱尔·米什莱（Thomas Couture 画）

这正是从时间与空间的次元，要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观的时代。也许当时的时代精神与今天全球化的环境有相类似的地方。在其著作《人类的圣经》中，米什莱这样论述：

“这是何等幸福的时代啊！地球的灵魂，因电报通讯线，而得享和谐，变得融合圆满。人们透过历史的连贯线，看到过去不同的年代，感受到那曾经存在的互爱精神。他们都感到高兴，因他们知晓地球的灵魂以往也有过相同的精神。”

“电报通讯线……”这种表现令人联想到今天的网络社会。十九世纪前期，是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黎明期。加上米什莱个人的乐观资质，几乎是无止境地，于无限大的时空次元对未来的文明世界充满着正面的期待。但，正如三十数年前罗马俱乐部报告书《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警告那样，米什莱的当时，与我们这被称为近代文明“斜阳”的时代，正好成了显著的对照。急速发展的网络社会，信息科学的泛滥，反而逐渐削弱了人类的交流，让“地球的灵魂”得享和谐的乐观状况已经不可复得。

这意味着米什莱的时代，通过把自己的文明相对化，欧洲人觉得人的力量及可能性是无限的，可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在米什莱的宗教观也如实地反映出来，就是他倡导的“宗教人性化”。

对米什莱而言，“人类的圣经”不只局限于新旧约《圣经》，还包括了汉字文化圈和几乎所有文明圈的圣典，如印度的《吠陀》（Vedas）、《罗摩衍那》（Ramayana）、古希腊的英雄叙事史诗及古典戏剧、波斯的《列王纪》（Shahnameh），还有埃及和亚述（Assyria）等地的著作。他认为，“人类的圣经”的真正的作者就是人类本身。在对这些著作进行全面比较验证后，米什莱作出了大胆明快的结论：“宗教是精神活动的一部分，精神活动并不只局限于宗教”。也就是说，他拒绝接受宗教里一切超越人、优越于人的因素，明确了宗教的人性化。

他还宣言：“我们已经看到，亚洲与欧洲是完全一致的，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的人，他们的想法、感受与爱心完全是一样的。因此，人类只有一个，只有一心而不是二心。贯穿空间与时间的大调和，已被永远复原了。”

从充满对人不信、闭塞感的现代来看，米什莱的这番话令人感到全不现实。虽然当时可说是近代文明的黎明期，但也会令人觉得他太乐观和天真。他所追寻的人性系谱，从古印度和希腊起，经过中世的黑暗时代，到达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所讴歌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如众所周知，这系谱受到历史的背叛。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奥斯威辛、广岛的悲惨经验，令人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是不能轻视的“双刃剑”，归根到底是不能对这种安易的乐观论表示全面赞成。同时，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个世纪末苏联的崩溃，为从历史进展的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的进步主义历史观打上终止符号。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做“将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德国谚语）这样的愚蠢行为。正如像米什莱诉说的：“我冀求，让我们更有点人性。让我们以一种人类从没有听说过的美德来自强自己。”我同意米什莱这观点。我们不能忘记人正是形成历史以及所有事物、包括宗教的主角。我们伸张的人性主义运动的成否，也取决于我们能否肯定、深化与薪传这思想。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米什莱对人的赞歌，与今天的“人道主义”这一字眼的含义虽相似但完全不一样。现今的人道主义，意味暧昧，没有骨格，感情用事而流于脆弱，而米什莱的却是有魄力和干劲。换句话说，前者并非进行真正的解放人类，对人不断增长的利己主义也完全缺乏节制，相反地，后者俱备着强烈的自律精神。

在《人类的圣经》的结尾，米什莱写出他继承了人类史的正统，说：“一种光的奔流、一条‘法’与‘理性’的大河，从古代印度开始流到 1789 年。……各个时代都一样，不朽的正义从自然与历史的坚实基础发出光芒。”他以“法”、“理性”、“正义”为骨格，自律，

为了阻止人类走向原教旨主义，我主张人性主义不应该躲避和放弃与恶的正面对抗。

自我改革，并自豪地宣言要成为历史的倡导人。如果把他对人性的赞歌比喻为“离心力”的话，那么上述这种自律改革的能力也可说就是“向心力”。只有这两者的均衡，才可以使人的心灵保持健康与平衡。

虽然米什莱所说的“法”在意义上有一些不同，但我认为这与佛教所倡导的“自归依、法归依”的构图有重迭的地方。在《大般涅槃经》中，佛陀对阿难说：“阿难！汝等当自为洲，汝等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洲，以法为归依，勿他归依。”可以看到，过去也是如此，现今也是如此，人要想成为生活的主角，要想活得更有人性，则必须以某种“法”为依据。

◇超越“部分正义”的诱惑

尽管如此，历史并不是向着米什莱所设想的方向前进。正如前边已经讲述过的那样，渡边一夫说到，“人的弱点就是很容易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机器、奴隶”。这种弱点，正如马塞尔（Gabriel Marcel）所说的“人会自己违背自己”，使人丧失了成为创造历史主角的地位。二十世纪，思想体系变得绝对化，也刮起了疯狂的战争与暴力的风暴。这不是米什莱所讲的普遍的“正义”，而是各种个别、部分的“正义”，冲着人的弱点，强词夺理地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相互冲突争斗起来。这正是走向原教旨主义的绝好机会。人看不清这些“部分的正义”会把他们导向如何的一个惨剧，只是抵不过眼前的引诱。

为了阻止人类走向原教旨主义，我主张人性主义不应该躲避和放弃与恶的正面对抗。人道主义含义有着和平、宽容、温和的正面，同时也有易于妥协、不够热衷的负面。就是说，不够力量与原教旨主义对抗。

毕生与纳粹对抗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宣言需要一种“战斗性人道主义”，说：“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种战斗性人道主义。一种清楚自身的价值，明白到绝不允许自由、宽容及怀疑的原理被毫无廉耻并不择手段的盲信所滥用和践踏。”（《告欧洲书》Achtung, Europa!）

渡边一夫说曼的这本书是他于动荡时期首先放在床头，接下来就经常放在背包里的座右铭。

纪德非常崇扬曼的“战斗性人道主义”，把它称为“最正当的人道主义”。可说，这与纪德把其作为“比我本身、比苏维埃更加重要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出自同一想法。

我认为这与佛法的人性主义精神斗争也是异曲同工的。我们 SGI 的佛法运动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所推行的是普世的人性主义，超越宗派和宗教原理。可说，我们从正面在向“宗教人性化”这文明史课题挑战。

另外，说到人道主义的最大武器，就不能不归结到“对话”这交流手段，一个人类史上万古常新的课题。对话本来就是人的一种本质，放弃对话也等于放弃做人的资格。没有对话的社会，只会变成墓地一样静寂。

人要成为具有聪明才智的理性人类（homo sapiens），就必须同时是能掌握言语与对话的言语人（homo loquens）。综观过去的历史，言论与对话经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条件。苏格拉底曾说：